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香港理工大學

论文题目：中心与边疆动态交互中少数民族学者的身份认同——纳西族学者方国瑜

学生姓名：罗涵秋

学系及学位：中国文化文学硕士

就读院校：香港理工大学

提交论文年份：2018年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香港理工大學

就读院校：香港理工大学

就读学系：中国文化学系

学生姓名：罗涵秋

提交论文年份：2018 年

论文摘要

方国瑜先生作为云南著名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教育家，一生著书无数，贡献巨大。一生以研究云南地区的地方民族文化与历史为己任。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学者，他在研究地方文史的时候对于地方少数民族有着自己的考究与解读，先生的得意门生木芹先生就曾经说过「先生的史地之学源于极强的国家情结……方先生不止一次同我谈到，纳西族从来就有维护国家统一之心」。在当时并未有多人研究「边疆学」的时候，先生就开始将目标转向自己的故乡—云南，详细地考证其历史文化与地理环境，为后人们查阅云南有关的史志文献提供了详尽的参考资料。

方国瑜先生出生于云南丽江一个普通家庭，本科肄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而后在南京研究所致力于民族语言学的研究，最后回到昆明云南大学任教直至去世。

在整个学术研究的过程当中，先生通过学术平台的变换改变着自己的研究方向，在前期奠定国学基础之后，后期努力研究云南地方历史文化。在逐步推进的学术研究过程当中，方先生对于少数民族研究更为深层次，内涵也更为丰富。笔者在阅读方先生的相关著作和文献当中，力图通过先生的字句，去找到方先生文章背后所蕴含的个人民族情感。试图通过先生解读中央与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视角来把握先生在背后的民族身份认同转换，最后，再将其立足在国家认同之上。

先生作为「纳西学」的第一人，其个人能力与观点都对后代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本文还将探讨继方国瑜先生之后，「纳西学」新一代人物如何充满使命感对民族文化继续进行研究。他们所采取视野与观点在承袭方先生的基础之上有了何种新型变动，以及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又是如何理解的。

在这个社会新环境之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将方国瑜先生为探讨对象，详细考量其社会关系、文化关系。希望在这个问题上，能够为云南地区少数民族学者的身份认同研究做出一点微薄的贡献。

致谢

凌晨时分，提笔写下致谢，似乎也是为自己一年半的硕士时光写下一个句点。一时间感慨良多，也愧疚良多。反倒不知从何下笔。当时在最后一刻决定为自己的研究生阶段留下一些东西，而选择写论文。在此特别想感谢韩孝荣老师和谢伟杰老师，在选题、论文修改的过程当中为我提供了很多的意见与帮助。尽管自己身为一名少数民族学生，但是对于自己的家乡的史志知识与民族历史知识却是知之甚少，而因为论文题目的相关性，得以在阅读文献的过程当中对于一些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有所了解。也更加认同于自己的民族身份。而不仅仅止于此，心里也希望以后能继续研究地方民族文化，私认为，地方人民对于自己身份的看法较之于外界对于自己身份的看法更为重要。

曾知晓学术生涯无边，却不知眼界观点如此多样。在香港就读研究生期间，学到看待问题的角度与方法远远比学到的知识来得丰富与有价值。每日下课完走在香港灯火通明的街头，看着形形色色的人在身边走过。心里总在想世界如此多样与丰富，来到香港让我体会到很多未知的可能性与人生态度。想着自己以前对于很多问题的单一看法也顿觉自己成熟长大了不少。想要感谢给我带来这些体验与经历的老师 and 同学们，这场人生特别的经历罗某定当特别珍惜。

但是在写论文过程中，因为自己懒惰，很多需要阅读的书目并没有完成，还可以进行访谈的人物没有进行采访，论文时间安排也不够合理，导致后期赶制论文。

「此时当年少，莫负好时光」，愧疚万分的时刻也希望自己能够在以后惜时，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发挥出每一分钟的最大价值才好。

另外，需要感谢在写论文过程当中接受我田野访谈的和品正老师、余崇先老师等，对于我研究的内容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与鼓励。让我对家乡文化的研究兴趣趋向浓郁。最后，特别需要感谢我的论文对象——方国瑜先生。在研究过程当中需要不

断阅读他的著作，尽管对于我来说，略显吃力。但是在坚持阅读重，我看到方先生为了地方民族史志所作出的贡献，我感动于这些老一辈学者对于学术科研的尽心尽力、细致与认真。看到他的学生为他写回忆文时，一句「知先生最后一息，尚在继续从事他的学术研究。」不禁感动不已。感谢方先生以毕生的心血，为我们后人呈现了如此丰硕的学术成果，让我体会到身为一名少数民族，应该对自己的身份充满自豪，为自己的家乡而荣耀。感谢！

论文结束，人生又一阶段也宣告结束。不知道未来的自己将从事什么工作，或是能否继续学术生涯，但是「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在这般美好的年华中，总是应当尽心尽力地做好每一件事，不让自己有后悔愧疚的想法才好。

目录

一· 论文前言

- (一) 选题缘由
- (二) 学术研究回顾
- (三) 研究思路
- (四) 研究创新之处

二· 论文正文

- (一) 方国瑜先生学术简介
- (二) 方国瑜先生与《么写文字汇》
- (三) 方国瑜先生与爱国运动
- (四) 方国瑜先生与《纳西象形文字谱》
- (五) 方国瑜先生研究其他少数民族
 - 1. 彝族、傣族和白族
 - 2. 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
- (六) 方国瑜先生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 1. 民族认同
 - 2. 国家认同
- (七) 「纳西学」的后人们
 - 1. 后代纳西族学者们的学术思想
 - 2. 「纳西学」后人们民族身份及意识的强化
 - 3. 如今少数民族学者身份的意义

三· 论文结论

四· 参考材料

一· 论文前言

(一)· 选题缘由

统观方先生的学术经历，从丽江到北京，再到南京，最后落脚在昆明。在地域转换过程当中，方老的学术研究方向不仅仅有了不同的转折和确立，在此之中，由于研究方向的转换，接触到的资料和实地调研的经历不断地增加。方先生对于云南地区的个人地方情感也在不断上升，自己的民族身份也在其中有了一定的转变。以至于在最后他选择回到昆明一心一意专注于地方民族文化研究，可以说，方先生的家国情怀在研究角度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步步加强。

方国瑜先生以一个纳西族学生的身份，在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就读后，致力于研究古代汉语的内容。借助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平台，他得以认识许多优秀的老师与同学，慢慢将自己的视野聚焦于家乡—云南。他在致力于研究地方文化的同时，将在其他地方受到的研究理论及方法应用进研究地方文化之中。在当时研究地方历史文化的学者还并不多，因此他慢慢成为了沟通中心与地方边缘的一个重要角色。

并且在解读地方历史与文化时，方老时刻将所研究的内容置于整个中国的大环境当中去讨论，获得了国内外学者们的关注。因此当《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开始时，他被指定为西南部分的绘制者。此外，在1950年开始的『民族识别』当中，他为云南地区少数民族的识别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方国瑜先生所做的一系列工作，除了对于地方文化传承与保留有巨大的作用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们对于西南地区的关注。

(二)· 学术回顾

方先生一生治学严谨，获得后人无限敬仰。对于研究方先生的文章，笔者梳理

了几类。第一：方国瑜先生的学术研究

可以肯定的是，学者们对于方国瑜先生的学术研究进行探讨与总结的占据较大比重。比如方福祺著《方国瑜传》、林超民著《文章惊天下 道德著春秋——一代宗师方国瑜》、《方国瑜在国学研究中的贡献》《方国瑜与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研究》《整体性：方国瑜的理论研究》，潘先林《方国瑜先生与彝族史研究》、《家国情怀 书生本色：方国瑜先生的中国边疆学研究》，张晓梅《方国瑜对云南古代地方志目录研究》，杨文辉《方国瑜和南诏大理史研究》，袁国有《方国瑜史料目录学的学术方法论及其意义》等，论文大都从方先生生前各方面的研究入手，详述其产生的影响与意义。

高志英、段红云所写《20世纪前半期云南边政学研究述评》、林超民先生在他所写的《博雅精深 学高身正——纪念恩师方国瑜诞辰 100 周年》中对于方先生的学术研究转折提出自己的看法：「正是严重的边境危机使得方先生放弃已经取得显著成绩的语言学、语言史研究，从音韵转向界务，从古代转向现实，从中原转向边疆的学术转向。开始了西南边疆政治、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的研究。」¹笔者认为，除了严重的边境危机这个客观因素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因素致使方先生对于自己的研究方向有了转变，例如方先生对于地方史志的热爱、民族身份的认同等等。笔者会在正文部分加以论述。此类研究着重于对方先生学术贡献的分析，再讨论在整个历史文化背景中的影响作用。

第二：方先生《西南边疆》杂志与西南文化研究室

娄贵品先生所撰《方国瑜与中国西南边疆研究》，论文《方国瑜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对中国研究的指导意义》，张昌山《方国瑜先生与西南文化研究

¹ 林超民，〈博雅精深 学高身正——纪念恩师方国瑜诞辰 100 周年〉，收入林超民编，《林超民文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页 379

室》，王振刚《学界对民国学人西南边疆问题著述研究综述》，杨文辉《一部不应被忽略的佤族研究著作——读〈滇西边区考察记〉》，林超民《方国瑜与西南边疆史地研究》等。这部分的研究内容大多是关于西南边疆的史地研究，着重于考察当时方国瑜先生主编杂志当中所讨论的问题。并对当时西南文化研究室所出「西南研究丛书」进行具体评论和相关关系研究。

（三）· 研究思路

本篇论文主要是从方先生的学术研究历程出发，详细考量先生在学术地点转换过程当中所写的相关著作以及讨论焦点的变化。以探讨他在学术研究的转向与推进过程当中，方老对于自己民族身份的看法为核心主线，系统地考量他在衡量中央与地方民族的关系当中采取的研究视角与态度、在研究其他少数民族时的国家统一性。最后对像方先生一样研究「纳西学」的学者们进行一定的探讨。

（四）· 研究创新之处

方先生可谓是「纳西学」研究的第一人，在丽江地区声望极高。他在研究过程当中对纳西族乃至其他民族的考量与观点，直接影响着后代纳西学研究的后辈与当地人民的自我身份认识与民族认同。

本文将重点对方国瑜先生是少数民族身份的学者进行研讨，寻找他从开始到结束的学术经历当中隐晦包含的自我民族身份认同。这种转化背后不仅仅是自我的认同，背后更是对于自己家乡，自己民族的认可。特别是方先生的着眼点是在地方民族史，本篇论文将更加深化其研究影响。另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他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优秀的学者，在中央与地方的文化关系解读中扮演的角色。

除此之外，本篇论文将对因为方先生影响而进行「纳西学」研究的后人群体们进行一定的解读，探讨类如以方国瑜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身份的优秀学者们，是如何在研究地方史中取得中心与边疆的文化关系的认识与民族身份的认同。他们的先锋

作用使得纳西族人民对于自己的身份有着如何的理解。

身处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如何取得国家认同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具有民族身份的先锋学者运用自己知识理论解读与平衡中心与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而其理论对地方人民的国家认同感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论文正文

(一)·方国瑜先生学术简介

方国瑜先生作为云南地方史以及民族史的开拓者与集大成者，被认为是「南中泰斗」与「滇史巨擘」。而纵观这位对西南地区的历史与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先生，其学术经历的转向也颇有趣味。1924年8月，方先生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就读，在同乡范士荣的影响下，选修了沈兼士先生的「读书法」、钱玄同先生的「清代学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梁启超的「中国文化史」，并旁听高一涵的政治学、陈大奇的认识论、赵元任的语言学等课程。可以看到，在这一阶段中，方先生以广泛涉猎为主，为了探求学习方法与自己的奋斗方向的科目而努力。

由于这种基础性的阅读与学习，为后来方先生的学术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完成了两年的预科学习之后，在本校就读于国文系继续学习。在此期间，方先生受到班主任钱玄同先生的深切教导，对于音韵学有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在此期间主编《国学丛刊》，受到本系学子的一致好评。在北大读研究生期间，方先生以音韵学为自己主要的研究兴趣方向，他考证了大量唐代韵声的相关书籍，写出了《隋唐声韵考》一书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受到马裕藻先生的肯定。而其中对于音韵学知识的运用与考虑、相关材料的查找与阅读，为方先生在后来的纳西民族语言的研究当中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北京大学毕业前夕，北大研究所所长刘半农知道了方国瑜先生是纳西族的民族身份，遂对其有了兴趣。再加上刘先生本身研究语言学，就鼓励方国瑜先生对纳西象形文字进行深入研究。方先生便在返回家乡之后着手相关资料的考察与准备。

1934年7月，就在方先生返回北京希望得到刘先生的教诲时，刘先生不幸病逝。方先生悲痛时仍然牵挂着自己急需编纂纳西东巴文字的使命。因此他希望能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跟赵元任、李方桂两位先生学习语言学。就这样，同年9月，他开始了编纂纳西象形文字的旅程。1933年方先生写出了《滇南旧事十则》、《唐宋间之云南佛教》、《石鼓文研究》、《云南的土司制度》等与云南社会文化宗教相关的论文。由此可以简单看出在南京研究所学习期间，方先生将自己的研究对象慢慢转换为云南这一块故土。在1935年，他通过认真的田野考察写出了《么些文字汇》，受到章太炎先生的肯定并提笔作序。

1935年，方国瑜先生参加会勘滇缅南段界务，被选为「中英勘界委员会」成员，在1935年到1936年3月底这段时间，实地田野考察了班洪等边地，写作了《班洪风土记》。在返回昆明时，袁嘉谷等几位研究云南历史文化老学者极力挽留，希望他能留下来继续为云南历史文化做贡献。至此，方国瑜先生考虑到研究故乡历史文化更需要当地的田野素材，才从南京研究院所转到云南大学进行任教。开始了云南历史文化的治学旅途。

（二）·方国瑜先生与《么些民族考》

《么些民族考》一文是方先生在1944年发表在《民族学研究集论》当中的文章。作为第一篇对纳西族渊源与历史的深入探讨，在当时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力。

在文章开篇，方先生就写道：「任乃强君著《西康图经民俗篇》，论及滇边诸侯曰：摩些为康滇间最大民族，亦最优秀民族之民族也。瑜研究康滇民族，亦同此

感，将为此民族缕述史迹，以供诸世之留心西南民族者。」²从这段中不难看出，先生对于本民族的自豪感无溢于言表。写这篇民族考释的作用也是希望将这个优秀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让更多人了解，为其争取更多的关注，能够起到一定的传播作用。当个人对民族身份有自豪感的同时，应该考虑其历史、宗教、文化等等因素的接纳与认可。我们不难在本篇论文当中找到方先生对于其自豪感的因素。

关于自豪感源于文化方面，方先生的论述为：「考自唐宋以迄元明，金沙江、雅砻江诸民族，以么些为俊秀，而么些诸部以丽江独盛。盖其文化较优，亦即与汉文化较深也。」³丽江清代实行改土归流之后，汉文化程度大大加强。当时的知府设立了「雪山书院」与「玉河书院」教授汉学。在《丽江府志》当中，对其有所记载「丽自设学以来，不数年间，郡士争自濯磨，群相淬励，駸駸乎化鄙陋之气，而闻弦诵之声。」⁴清朝丽江的科举情况为「进士七人，举人六十一人，副榜十二人，拔、优贡二十八人，岁、恩贡一百二十五人」⁵。方先生考究到丽江受到汉文化影响时间久，程度深。地方习俗文化摆脱得较为彻底，因此文化较其他民族优秀。

而对于纳西族人民文化程度较高的这一特点，方先生对其有自己的看法与见解，其中有这么两段相关叙述：「若以血统言之，今日西南民族中，鲜有不混血者。众族之汉文化程度有差异，亦即汉族血液多寡之差异，所以犹保持其名号者，则由历史观念使然也」⁶，「然至今日，嵩州以东南之马湖诸侯、西南之西番诸侯，交织么些，其文化悬殊实甚，则么些较诸侯为俊秀乎？考之古代记载，么些文化并未高于其他诸侯，其智慧亦未高于诸侯，则后来相差如是者，盖缘汉民族与么

² 方国瑜，〈么些民族考〉，收入白庚胜、和自兴主编《纳西学论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页6。

³ 方国瑜，〈么些民族考〉，页71。

⁴ 管学宣、万咸燕，《丽江府志略》（丽江县志编委会办公室翻印，1992）。卷1，页260。

⁵ 管学宣、万咸燕，《丽江府志略》，卷1，页342。

⁶ 方国瑜，〈么些民族考〉，页11。

些混血者多，而与其他诸侯混血者少，积久而至于次也。」⁷

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人种、血统的不同造就各方面的不同是当时普遍的说法。从上面方先生的解释当中不难看出，汉文化的优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方先生在当时对于汉族文化有着强烈的积极态度，并且他当时看到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人体生理个体性差异的存在，并且认为汉族血统有着很强的优越性。血液汉化的程度与民族优秀的程度是对等的。

从文章开头来看，方老对于纳西族的优秀程度是肯定的，并且对于其他民族的优劣有着明显的区分与比较。但是经过后文的原因分析，这份肯定来源于对汉族文化优秀的肯定。

在余斌先生所写《说顾颉刚，兼及龙云、方国瑜》当中有一则关于方先生的轶事记述。「1939年某日，云南著名学者方国瑜请陈寅恪、顾颉刚等前辈学者及其他同仁吃饭，其中一位姓方名杰，原籍浙江诸暨，祖籍安徽桐城。席间方杰请教方国瑜这位『宗兄』，问『云南方姓是从哪里迁来的？』方国瑜答『我是桐城方氏后裔』。顾颉刚饭桌上没讲，饭后却对方杰说，方国瑜是纳西族，自称桐城方氏后裔为了面子上好看些。我觉得顾颉刚这么讲未免随便，且不无民族偏见（陈寅恪亦然）。」⁸

从这一则轶事上来看，方先生对自己家族的来源与历史已经有所考究。历史上的「桐城方氏」方氏聚居于江苏溧阳天目湖桂林、安徽歙县一带，以汉族为主。名人辈出，后代遍布广泛。这则轶事被收录在余斌先生所写的一本《书摘》当中，其真实性与来源性并无太多可考证，在此笔者也仅作为一个辅料进行摘录辅证。

⁷ 方国瑜，〈么些民族考〉，页75。

⁸ 余斌，〈说顾颉刚，兼及龙云、方国瑜〉，《书摘》，第5期（2008年），页35。

结合上述方先生对于血统的看法来看，初期方先生对于自己民族身份的看法并不如表面我们看到的积极肯定，或者说这种身份认同感来源于自己是纳西族与汉族混血人种所产生的「优秀文化」，而并非是关于纳西民族文化与精神的肯定。不难看出，文化程度是方先生衡量民族优秀与否的重要标准。汉族文化在当时社会当中占据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并且成为社会衡量一个地区是否文明的重要标志。

纳西族地区的汉化程度相对较高。早在「木氏」七氏阿甲阿德于明代打仗胜利之后，便得以赐汉姓「木」，一直沿用至今。较周边藏族、彝族更名时间早。其后各代木氏土司善于学习汉族文化，再加上丽江所属通商要道，所接触外界时间较早。后期在「改土归流」实施之后，汉族文化更是兴盛。

另外，方先生在文中描述纳西族的生活习俗时，写道「而语言中有本语者，大率为简陋之器物；若稍精细者，则用汉语。这足以证明么些族在未接受汉文化之先，其生活甚陋。其族逐渐进步者，即缘汉文化逐渐输入。」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在国家民族委员会所撰写的《新中国成立前少数民族社会状况》当中就已经写道：

「在政治上，旧中国广大少数民族的生存权和基本政治权利是没有保障的。在封建专制时代，历代封建王朝都推行了一条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政策，对于广大的少数民族使用了战争征服、经济掠夺、强迫同化、文化摧残等手段，少数民族的生存权和政治权利被剥夺。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大肆侵略中国，一步一步地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各民族人民不仅毫无例外地遭受到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而且还受到国内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甚至不承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致使许多少数民族群众不敢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更谈不上什么政治权利，少数民族处在十分悲惨的境

地。」⁹当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之前少数民族没有真正的自豪感。落后的社会制度往往造就了落后的生产方式，「刀耕火种」的粗放耕作方式仍然是少数民族的主要选择，因此无法对先进一些的器物有着认识与命名。

另外，在少数民族的名号上，方先生也做出了自己的解读，如下：「今西南民族，每有讳称其种族之名，盖以为文化已同于汉人，无须存在其初有之名号。正由一号代表一文化集团，既无独立之文化，则特有之名号亦无存在之必要」，「今之纳西（音译）族受汉文化陶铸已深，则不惟不用么些之名，则纳西（音译）之名可废。」¹⁰

方先生认为一个「民族」的名号存在与否是根据其独立文化存在与否决定的。可见在当时方先生判断一个民族是否存在标准也仅仅是从表面范围的文化角度考量，并未考虑少数民族人民的宗教、意愿等等原因。更深层次来说，方先生当时对于少数民族的称谓看重方面，并未有太多着重考虑，仅仅是将其作为一个名号进行提及。背后的历史渊源等都未涉及考量范围。

从以上来看，方先生将民族的进步程度都归结到汉文化的进入上面，对于汉文化的推崇与肯定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的方先生纵然已经开始西南地区的研究，但是对于民族身份并没有如此肯定，或者说这份自信是借助汉文化来完成转化的。纵然有对于本民族的研究与调查，但是对于本民族的文化与传统，并未持有太多的肯定意见。

但是这不得不联系当时的社会环境与家庭环境来看待。在新中国解放之前，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并没有享受到与现在同等的地位与权利。边疆地区自然环境没有平原优渥，「蛮夷之地」的思想深入人心。「历史因素考察，少数民族深

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前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状况〉，少数民族人权专题 http://www.seac.gov.cn/art/2004/8/4/art_2964_68490.html，2004年8月4日。

¹⁰ 方国瑜，〈么些民族考〉，页11。

受阶级的和民族的双重压迫。历代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和挑拨，不仅是少数民族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因素，也是汉族同少数民族以及各民族之间相互猜疑、存在隔阂的根源。」¹¹

同样的，这其中包括了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习俗等的歧视。再加上纳西族是汉文化交流相对较早的一个民族，在汉人思想文化的影响下，本民族地区的人民对于民族的文化习俗也常常持有与汉人同样的观点。。

方先生从小家境不错，就读于私塾，每日「晚上回到家里，伯父和叔父教他读《四书》，使他不仅能够背诵，而且能够讲解。他节假日和寒暑假也不休息，在家读《幼学琼林》、《左传句解》、《古文释义》、《史记精华》等书」。从小接受的都是汉学方面的教育。再加上祖父辈都经商，走南闯北希望孩子得到正统教育。从方先生的伯父方堃力求将侄子送去远离边疆地方接受教育，就可以看出当时父辈对于边疆地区文化教育的看法，直到最终方先生选择了远离云南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去学习，才获得了他伯父的同意。

以上可见，当时地方文化的思想意识形态对于普通民众的教育选择等都有很强的影响，对于其后个人的民族身份认同也有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正是因为方先生有了前期的经历，才能够在中心发现地方与边疆，才能够后期对于地区少数民族研究做出巨大的贡献。

（三）· 方国瑜先生与爱国运动

方国瑜先生从最开始研究国学，继而转为研究地方史志。这其中的家国情感转换与方先生在民国时期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早在 1918 年方先生还在丽江读书时，他已经开始对「五四」运动产生兴趣，经常去借阅《新青年》等书籍来阅读。

¹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前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状况〉，少数民族人权专题 http://www.seac.gov.cn/art/2004/8/4/art_2964_68490.html，2004 年 8 月 4 日。

等他真正到北京之后，他立马投入到相关的政治集会当中。在进入北师大预科就读期间，他和同班同学谢伯屿一起被推举为校学生会干事。1925年，上海日本内外棉纱厂工厂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中国工人进行罢工。在日本资本家打伤了中国工人之后，大量爱国运动学生走上街头进行反帝宣传。方国瑜先生名列其中，他跟随大部队到天津、济南等地进行宣传与呐喊。到了1926年，方国瑜先生与北师大学生一起进行了国民大会与游行请愿。在游行过程当中，先生还被警察镇压打伤了右臂。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方先生参与到新滇社当中，参加其中《云南周刊》的编辑工作。当时，方先生在周刊上发表了《政治思潮与教育》与《中国革命之意义》两篇文章，第一篇主要是申诉革命的必要性，而第二篇则主要叙述为什么要进行革命，他在当时还写道「中国是世界上被压迫之一，中国问题就是全世界中的一部分问题-----，所以我们的眼光应该时时射到全世界。」¹²从其言论及参与的运动中可以看出，方先生在当时是一位热血青年，关心祖国的前途与命运。在当时就能够将中国命运与全世界的命运联系起来，实属不易。在这一阶段当中，可以看到方国瑜先生对于祖国完整性的情感。

之后在1926年6月，方先生因为身体原因，回家乡静养。在疗养的过程当中，方国瑜先生被邀请到地方自建的学社「柏林学社」当中讲课，他在授课过程当中主经常将《新青年》等杂志借给当地同学们看，希望同学们能够在其中汲取到新思想。除此之外，丽江地处边远，纳西语有浓重的腔调，这导致相当一部分人在讲汉语时对方无法听懂其内容。方先生希望能够多推广国语，使得更多的人了解认识汉文化。他在1927年担任国语促进会的主任，做了许多有于此的推广工作。

¹² 方国瑜，《政治思潮与教育》，《云南周刊》（北京），三十五期

在疗养的期间，方先生主要阅读的书目为一些先秦典籍，如《清经解》等。与此同时，他也阅读了一些地方志书，如《云南备征志》等书，在方先生的《读书录》当中，就有笔记：「地方志书，所以布国学之不足；国史载其大者（以关系言），志书载其小者；量不同，质则一也。故志书应待作国史志一小支脉。」¹³他在当时就认为，地方史志应该在中国史志当中有一小块地方。

从以上方先生的经历可以看出，因为亲身经历过民国时期一连串的学生运动，并受到「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方国瑜先生有着很强的国家情感。再加上方先生在家休养的过程当中阅读地方史志，这种国家情感很自然就联系到地方情感上面来。国与家的情感开始有了一定的转化与联系。

1927年，方国瑜先生还没有深入研读相关书籍和论题研究，因此这种情感的联系与转化也仅仅是将其停留在先生的思考和读书笔记当中。并未有更多的展现。随着方先生对研究的不断深入，地方史志文献阅读量的扩大。方先生对于家国情感的感情更加浓烈。而需要提及的是，这种情感的基础是在当时就已经打下的。只是由于当时方先生以研究国学为主，并未太多涉猎到地方民族史地之学，因此情感还未得到升华。

有学者研究纳西族的国家认同历程，认为纳西族的中国认同「经历了自发到自觉，从政治行为上积极参与认同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活动。从主动认同中国，到思想意识上的中国认同，从社会上层的认同到民众的普遍认同的主要发展阶段。纳西族形成了『以国为重』的政治认同，产生了强烈的国家意识和国家归属感，将祖国（中央政权）视为自己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所」¹⁴，我同意这样的观点。方先生在

¹³ 方国瑜，《读书录》丁卯第一册，1927年3月

¹⁴ 潘先林，《家国情怀 书生本色:方国瑜先生的边疆学研究》，收入林超民主编，《西南古籍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页312—319

早期亲身经历了各项运动之后，在个人行为上对于国家认同是毋庸置疑的。其后在研究进程当中，不断加深自己对于国家的认同。在这种思想关系情感的转化过程当中，对于地方与国家的关系有了自己更深一层的解读。

方先生在北京读预科时才第一次离开偏远地区云南，来到北京。对于地方与国家之间的整体差异性，他应该有着很深的感触。从一直以来边远、较为闭塞的边疆地区一下跳到全国政治中心、信息汇集集中的北京。在这种对比当中，先生应该较于周围其他同学对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有更深刻的感悟与理解。笔者认为这是先生积极投身于一系列民主运动的因素之一。

传统「家国一体」的情感对于方先生来说太笼统与模糊。因此在一进入北京之后，先生无论是在参与民主运动中还是研究过程当中，家国情感的体现和转化渐渐变得具体与明晰。再加上方先生直接从丽江进入到全国的中心，并未先在省级中心学习。强烈的对比性使得方先生心理的家国情感冲击较为巨大，以至于后来先生才能够在中心地区发现边疆，在汉族当中找到少数民族进行研究。

(四) · 方国瑜先生与《么些文字汇》

方老在 1935 年写成《么些文字汇》一书，后来由于顾颉刚先生希望能够将本书交由美国人罗伦士翻译，再进行中西合璧由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方先生本着纳西文化传播的原则欣然同意。没想到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罗伦士携带书籍与照片回国，方老几次写信寻找，也杳无音讯。后来经由吴晗先生建议，方老将书籍寄到文字改革委员会希望能今早出版。没曾想「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书籍的出版工作再次遭到阻断。1972 年。方先生到北京治疗眼疾，在此期间仍然一心想着《么写文字汇》的书稿。几经周折托熟人在北京将稿子寻回。终于在 1972 年 9 月与郭沫若先生沟通后，由和志武先生校订。在 1980 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部著作经历了 40 年的风雨才得以面见世人。方老先生在这 40 年期间一直为本书的出版工作做着努力。纳西东巴文字不仅仅只限于文字的范畴，很多纳西人民的生产生活、文化习俗深深蕴含在其中。方先生不仅仅是作为一名学者，也是作为一名纳西族，更是希望他人能够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肯定自己民族的文化精髓。因此在 1980 年，方先生在去世前 4 个月仍写信给美国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希望通过「中美文化交流」的方式将纳西文字推广给更多人看到，使更多人认识纳西文化。张光直教授在 1982 年给予了回信，可惜正当方先生预备进行更多文化宣传工作时不幸去世。

在当时的丽江社会当中，大多数当地居民都认为东巴教是巫教活动，对于东巴教，方先生曾在《纳西象形文字谱》前言当中有叙述：「滇西北丽江一带纳西族地区，流行着东巴教，这是一种巫教从事祈神禳鬼的迷信活动。」¹⁵而后对于宗教内容不再有赘述。可见，当时地区的人民收到汉文化影响，对于民族宗教文化并不苟同，认为这是封建迷信活动。

在语言文字上，丽江也在较早时期就放弃了东巴文字的使用，在运用文字时多是以汉文为主。在书中，方先生对其有著述：「一般社会生活所用到的也都是汉字，只有东巴教徒用这种文字写经书，而被认为鄙俗，受到歧视」¹⁶，由此看来，当时纳西社会当中对于东巴教以及东巴文字的态度都是消极的。在 1932 年，在刘半农先生的提点下，方先生开始进行东巴文字的收录工作。在这个转折点时，方先生也自己记录道：「刘先生刺取其书中若干事，与我反复讨论，能知大概而未确切，当日窘境，至今犹在我心目中。」¹⁷有着一名少数民族的身份，但是对自己的文化

¹⁵ 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页 1。

¹⁶ 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页 1。

¹⁷ 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页 2。

并不十分了解。当刘先生进行询问时，对于自己民族文化的窘迫心境激发了方先生要认真研究纳西文化的决心。

方先生在前往北京求学之后，因为优秀资源的集中，他认识到了很多教授。学术眼界的开阔让他不再限于以前单一的民族社会文化当中，再加上他当时已经完成了本科的课程，学习音韵学等课程已经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启蒙者刘半农先生的提醒下，提点了他的民族身份。方先生更是希望能够一改以前对于地方社会文化根深蒂固的不自信。他听取刘先生的建议，回乡就开展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在刘先生去世后，也是这份迫切希望民族自信力的提升以及传播民族文化的思想使他坚持不懈的做当地民族文化研究，以及坚持将《么些文字谱》出版。

在 1932 年，方先生开始对纳西文字进行关注后。先生在进行搜索整理材料一年的时间里，对于纳西族的历史来源进行了重新的考证与解读。其中在上文所提及的民族称谓「么些」，不同于上述先生所述：民族已被汉化，应当被废除。方先生给予了新的解读：「至于么些为他称，见于记录无定字，同音异写，且含有污蔑，应当废除。」¹⁸

另外，在对于唐代么些族的定居区域，方先生也给予了新的补充及说明，原来先生依据《元史·地理志》、《旧唐书·本纪》、《新唐书》以及《南夷志》等史学文献，对于丽江境内的各个地名给予了回顾与分析解释，因此有著「以上文所释之地名，知唐代么些族所居，即在金沙、雅砻江流域。」而在后书《么些民族考》当中，方先生主要依据地方文史资料《嘉庆四川通志》、《三国志》、《华阳图志》等对其进一步详述：「大抵，今雅砻江下游盐源、盐边两县，唐代为么些族居住之地。」¹⁹在文中，方先生也自己道：「瑜前写么些民族考一文，刊于一九四四年出

¹⁸ 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页 3。

¹⁹ 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页 12。

版的民族学研究集刊第四期，大体编辑资料，而错误甚多。兹略说渊源迁徙和居住区域，可以了解这个民族在历史上分布的情况。」²⁰

另外，在序言当中，方先生提到「纳西(音译)口语，纳(音译)的普通意思还有『黑』之意，但纳西(音译)不是『黑人』之意，『黑人』应该为『西纳』(音译)，修饰语在被修饰语之后」²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当中上，有很大一部分的舆论解释「纳西族」的名称时，将其强行对应于「黑」的意思。并称「纳西族」是「黑人」的民族。这种舆论对社会看待纳西族的立场有着一定的偏见。方先生在《么些文字谱》一书的绪论注释中对其进行说明。这样的解读，一方面力证了纳西族在称谓方面受到的歧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方先生对于民族称谓的重视，对于本民族名称上受到的污化立即修正，对自己民族的维护与拥护。

从以上可以看出，方先生在前期写《么些民族考》时，并未对民族的相关历史文化记录有更多的考量。而在后期不断地实地走访以及查阅文献的过程当中，先生对于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有了更加清晰地认识。

「他已经涉猎了一些有关云南史地的书，读了这些书后，方国瑜感到前人在这一块领域做出的成绩很少，而且不实实事求是之处甚多，尤其是古代部分，对少数民族的历史一味歪曲与污蔑，这使他感到气愤和不平」²²「方国瑜认为，对占全省总人口相当比例的少数民族历史缺乏研究，这不是真正的云南史，应该有人来专门做这个工作。」²³由以上可见，当时方先生就已经意识到民族地方史志研究的重要性，但是并未认识到自己需要扛起这个责任来。而在后期，先生完全投入到史志研究当中之后，才慢慢对此民族群体有了相较于之前深层次的认同，而这种心理认同使得先生在考究与书写过程当中，有了较于其他学者更为深层次的成果。

²⁰ 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页 36-37。

²¹ 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页 4。

²² 方福祺，《方国瑜传》，页 66。

²³ 方福祺，《方国瑜传》，页 66。

另外，先生此作是在南京得到赵元任、李方桂两位先生的帮助。还协助他一起制定了纳西语的音标。而后，先生带着初稿到苏州请教李根源先生。李根源先生和周钟岳先生都是同门，而方先生在 1933 年回到昆明时就与周钟岳先生有交流，并通过周钟岳先生了解到李根源先生。方老回到南京后，就在书信中透露出自己想跟李先生学习石刻碑板的知识。李先生看过方国瑜先生的文章觉得不错。在方先生携带书稿跟李先生探讨过之后，李先生亲自带他拜访了章太炎先生。先生不仅立即为书稿作序，还与方先生探讨了西南民族问题，

他说道：「今日所谓汉蛮，实为同种也：汉族自西方来，蛮族亦自西方来，其本族即羌，后两族分地而居，文化自殊，然语言为单音，名号从其父，是汉蛮所同，因自一本使然也。」²⁴

章先生对于「汉蛮」问题的解读来源于《禹贡》，「禹生于石纽，而在今大金川，故《禹贡》载川滇水系。若谓禹治水于此，则川滇多山，江水夹谷蜿蜒，何必治之？既不治，而载在《禹贡》者，正以其地为禹之故乡也。《禹贡》所载，即当日中国本部之地，北不及东三省，南不及两广，而是时非中国领土也；云南载《禹贡》，则云南当时为中国领土可知也。汉蛮本是兄弟，自分居后，汉得汉利，进化较速，于是汉轻蛮为异种……」²⁵。

以上可以看出，当时章先生凭借《禹贡》当中的记载来断定汉蛮的来源，一方面，章先生的论断以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过于武断，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在当时社会当中对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来源研究并不多，章先生才会武断下此论断。且不论这个观点的对错，章先生对于汉族与少数民族「同源性」的观点使得方国瑜先生对后期民族研究有一定的启发性。对于后面的学术研究也有一定的帮助。

²⁴ 方福祺，《方国瑜传》（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页 49。

²⁵ 方福祺，《方国瑜传》，页 49。

(五)·方国瑜先生研究其他少数民族

1. 彝族、傣族、白族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考虑到以前旧中国存在的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再加上很多少数民族的成分不确定甚至混乱。因此在新中国建立时，为了对我国的民族成分以及族群有清晰明确地认识，在 1950 年代开始，中央及地方民族事务机关组织科研队伍对全国 400 多个民族名称进行识别。直到 1983 年，结合之前公认的民族，总共识别出 55 个少数民族。这项工作所识别出的民族种类一直延续到今天。1950 年代，方先生被委任为民族识别研究组副主任。在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中，方先生主要负责「乐墨」「怒」「述」「西番」民族的识别。他编写了元明清时期的云南土司简录，作为参考资料。

对于此，方先生曾经在自述当中写道「新中国成立后，宣告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重视边省建设，为旷古所未有，社会历史调查，亦大改观。」²⁶方先生作为具体的执行者，积极进行云南地区少数民族的调查工作。

「彝族是我国首批确认和识别的民族之一，其支系繁多，各支间发展差异较大，而且彝族是自称和他称较为复杂的民族，自称他称并不完全一一对应，所以对彝族的识别，有助于深化对彝族历史的认同以及增加自身整体的认同，同时也有利于国家政策的落实。」²⁷

《彝族史稿》是方先生在 1980 年代定稿的，真正出版是在 1984 年。当时方先生是为了配合 1954 年的民族识别工作而开始进行彝族史的研究，后来在 1959 年亲

²⁶ 方国瑜，〈略述治学经历〉，收入白庚胜、和自兴主编，《纳西学论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页 3。

²⁷ 方国瑜，《彝族史稿》（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页 4。

自去楚雄彝族自治州进行田野考察，参与编写《彝族史》的古代部分。后来由于在云南大学开设了「彝族史专题」课程，需要编写教材。方先生开始详细地考证彝族的史料，将其叙写现代史。最后经过重新改写等一系列工作，最终将《彝族史长编》成文。后来在 1980 年代再将其定稿为《彝族史稿》。

在本书当中，方先生对于彝族语言进行了一定的考察。值得一提的是在本书当中方先生在考察彝族的渊源时，他考证到彝族的迁移方向是自北向南，为了寻找更适合于生活要求的环境，从祖国的西北迁到西南，应该是与「羌人」有关。

方先生从民族语言学的角度来考察这个根源问题，他将古代羌人的语言记录《白狼诗歌》与几种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比对与考究，认为与古代纳西语、普米语以及西夏语接近，再从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来看这几种语言与白狼诗歌较为接近。因此这几种语言有同源性，方先生再进一步比较进行比对，彝语与羌语有亲密的亲属关系。他们都是羌族的一支分支。

《后汉书·西羌传》有记载「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²⁸，越乔在大渡河以南。是古代彝族的主要聚居区，是羌的一支；从习俗文化上来看，在《西羌说》当中有 1.以父名母姓为种号，2.十二世后相与婚姻 3 父歿与妻后母，兄亡则纳螯嫂等等六条，与彝族的生活习俗相比较，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从文化、语言、名称以及迁移方向上来看，彝族与羌族有紧密地联系，彝族渊源出自古羌人也可以成立。

方先生不仅仅将彝族来源于羌人的推断进行了论证，同时，对于彝族与其他民族的相关性也有所陈述。彝族语言丰富，但是有相当一部分的词语出自于纳西语、傈僳语、哈尼语等；另外，从迁移方向来说，几者的迁移方向都是自北向南。同根性得以论证。在方先生的研究下，民族的根源性有了一定的解读。

²⁸ 方国瑜，《彝族史稿》，页 16。

毋庸置疑，云南是个多民族聚集区，当然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一个重要的部分。方先生的研究使得更多的学者意识到同原体这个问题，专注于丽江纳西族研究的杨福泉先生在研究纳西族的黑白问题时，写过关于此类的一篇文章《再论丽江的『黑』与『白』观念》，他写道：「如果我们对纳西和羌人的宗教文化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崇白忌黑是纳西文化与古羌文化一脉相承的一种文化现象。」²⁹

「另外，喜马拉雅地区一直至我国『藏彝走廊』广袤地区的『本波』(本补、比摩、贝马、北布等等)信仰(或曰『本教』信仰)，有可能是这一广袤区域一种从萨满(shamanism)式的原始宗教信仰发展而来的民间信仰，在后期的本教渗透到丽江地区之前就早已经存在于尚未南迁的纳西先民以及『藏彝走廊』中的很多藏缅语族族群中，与藏族的本教是同源异流的民间宗教现象。」³⁰学者在方先生的探讨下，注重于纳西与彝族的关系研究。杨杰宏先生所写的《纳西族『黑』『白』崇拜》也有关于两族同源性的研究，在后人们对于两族「同源性」的一度解释及分析当中，解释了两族之间的「黑白」讨论。而这些研究都来源于方先生对于渊源的探索积淀。后人才能在两族问题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傣族作为云南省人口众多的民族，一直以来都获得极大的关注。方先生在1936年回到云南时就开始着手于傣族的研究。在1943年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先生都在将已经搜集到的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与分析，直到1958年，《元代云南行省傣族资料史料编年》得以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这本书当中，方老提出了元代的行省区划里，云南省包括了缅甸掸邦、泰国北部以及老挝北部，但是在撰写的时候依然采用了「云南行省」的说法。「如果根

²⁹ 杨福泉，〈再论丽江的『黑』与『白』观念〉，《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216期（2009年8月），页2。

³⁰ 杨福泉，〈再论丽江的『黑』与『白』观念〉，页2。

据今日政治区界把境外的史料删去，那不仅割裂历史，违背史实，而且不可能把历史发展的情形讲清楚。」³¹他仍然将历史作为一种发展动态来考量，不单纯以今日的格局来定夺历史。此外，在书中方先生也提到「历史渊源关系密切，不能孤立的只讲云南傣族，所以写了『元代以前傣族的住居区域』作为绪论，说明各地傣族的关系以及与临近各族的关系，从错综复杂的矛盾来看历史发展过程」。

此外，方先生在 1950 年代对「白族」进行了研究，在《略论白族的形成》一文中，提出「南诏建国以前住在洱海南部的『白蛮』，由夔道（今四川宜宾）迁来是很可能的。据《吕氏春秋·恃群览》所载夔人原住在青衣江入岷江（古离水）地带，属于氐羌系统，后迁到岷江入金沙江处」³²。

方国瑜先生认为，洱海区域在九世纪以前有「昆明族」、「哀牢夷」、「百蛮」等多种族系存在，而这些族系之间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不同，彼此之间的斗争也此起彼伏。部落与部落之间一直存在着冲突与兼并，最后，就产生了较大的部落如「六诏」等。由于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以及抗唐战争的影响，各部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组织，由统一而联合为一体，最后发展为一个人们共同体——白族，这时已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因此，方先生认为「白族」是一个多民族融合而形成的共同体。

方先生的研究触角涉及多个民族领域。纵观方先生的各民族研究史，他不以孤立的某一视角来研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区域，整体的研究视角事实上更加开阔了他的民族研究方向。

³¹ 方国瑜著，《元代云南行省傣族资料史料编年》（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页 3。

³² 方国瑜，〈略论白族的形成〉，云南人民出版社编，《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75 年），页 25。

在地方民族文化的研究当中，如果以狭隘的民族思想来研究民族发展史，那么很难获得其他民族对于自己民族的身份认同，更不用提自己的民族能够在国家取得相应的地位，取得国家的认同。只有在研究其他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当中，认识到民族与民族的同源性或者相似性，肯定民族融合与交流，民族的发展才能长久。而我们也才能够在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反鉴自己。

2.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共融

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地位并非一开始就达到现在这样的局面，在《方国瑜文集》辑一中写道：「我国自远古以来在辽阔地域逐渐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各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边地长期处于落后阶段。历代王朝设置政区，适应社会基础」³³「由于统治者之偏见，歧视边地，认为羈縻，实行大民族主义压迫，更使发展延缓。」³⁴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可避免会造成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并不足以成为本民族人民「骄傲」的条件。在方先生研究少数民族的论集当中，他都会将该民族与汉族互相融合的情况作专章说明，说明方先生在这部分有一定的重视。

云南地区的汉文化传播之后，对该地区的文化历史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在先生所写的《汉晋至唐宋时期在云南传播的汉文学》中，他曾写道「云南境内自汉以来传播汉文学，绝不是偶然，这是由于云南历史发展是全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云南各族人民历史发展与汉族人民团结是不可分的」³⁵，方先生在文中引证了大量的史书来说明科举、儒学等一系列汉化的主张使得地区少数民族人民得到了许多帮助。

³³ 方国瑜，林超民编，《方国瑜文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页 515

³⁴ 方国瑜，林超民编，《方国瑜文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页 515

³⁵ 方国瑜，〈汉晋至唐宋时期在云南传播的汉文学〉，收入林超民编《方国瑜文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页 546。

方先生认为，汉族人口有着较为先进的文化，定居在云南的时候就将自己融合进少数民族群体当中，把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生活都传播开了，这对于云南各族在历史中的发展中有着重大的意义。将汉族移民与云南历史发展的关系问题作为研究云南地方史的一个重要问题看待，方国瑜是第一人。「封建王朝之所以能对各族人民进行统治，并不决定于王朝统治者的雄才大略，而是决定于汉族与各族人民的联结为一个整体。」³⁶

在研究彝族的过程中，方先生就写道「凉山地区彝族社会经济发展，首先是社会内部因素的不断变化……而是与汉族人民有着最密切的关系，友好互助而发展起来的。」³⁷彝族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在汉族地区的先进农业生产工具以及新品种的农作物流传进该地区时，极大的改善了该地区的农业生产效率以及农业生产发展，促进了一定的经济发展。另外，在社会经济方面，彝族地区一直以来就是奴隶制，汉族人口进入后，在周边进行贸易等活动，使得自由经济开始进入该地区。

在对傣族的研究中，对于其居住地的傣汉叙述，就有「傣族习居湿热之区……底谷平原多傣族，而他族及汉人则居于半山上」³⁸，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傣族地区一直以来是封建农奴制，而汉人根据该地的气候「来往傣族地区经商之汉人，立冬来，立夏去。」³⁹将自由经济贸易慢慢带进当地，促进经济发展。对于两者相处关系，也有论述：「土人与汉人参错而居，融洽无间，已渐同化于汉人。」

40

³⁶ 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页 3。

³⁷ 方国瑜，《彝族史稿》，页 560。

³⁸ 方国瑜，《滇西边区考察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页 246。

³⁹ 方国瑜，《滇西边区考察记》，页 254。

⁴⁰ 方国瑜，《滇西边区考察记》，页 244。

白族与纳西族的汉化情况已经在上述提及，在此不再赘述。少数民族虽多在边疆地区，但是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有汉族的融合，文化的交融才能够发展至今并且被承认。方先生在研究各个少数民族的过程当中，不忘提及此点希望少数民族与汉族和谐共处，在文化的交融中谋求更好的发展。

（六）· 方国瑜先生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1. 民族认同

笔者查阅了关于「民族认同」的相关材料，对于此的解释，国内外的学者有着不一而足的解释与定义。在此，笔者多用国内学者对于此的解释来进行讨论。国内学者大都从多民族国家内某一具体民族的意义上来讨论民族认同，然又各有侧重。有学者肯定民族历史文化在民族认同中的基础性作用，认为民族认同是指「构成民族的成员（个体）对本民族（整体）的起源、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的接纳、认可、赞成和支持，并由此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民族依附感、归属感和忠诚感。」⁴¹在笔者看来，民族认同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自身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外界对于自身进行思考才缓慢形成的。它应该会根据时间以及经历等等改变，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一样的体现。

方国瑜先生在刚刚接触地方民族史的研究过程当中，对于自身的民族身份并未多有在意，这一点在上述已有所提及。确切来说，他的民族身份是借助于汉族文化的影响才成立的。到了中后期才开始慢慢发生变化。上述所说历史文化固然重要，但是需要时间让地区人民了解与接触才能逐渐产生对于本民族的民族认同。

⁴¹ 陈茂荣，〈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学术界》，(2011年4月)，页25。

费孝通先生在看待民族认同问题上面，有记录道：「生活在一个共同社区之内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触。将不会有认同产生，故民族作为『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也就『必须』和『非我族』的外人接触」⁴²。方先生从小就在丽江长大，一口浓重的纳西腔调一直到后来都没有得到改变。在当时的环境当中对自己的身份并没有过多的考虑。而当他到北京求学之后，老师开始注意到他少数民族的身份，遂开始有了后来的学术研究。民族身份的提点使方先生注意到本身与其他学生的不同点，而这种身份是方先生通过与外界的互通才产生的。

当时社会环境还较为封闭，少数民族地位不高，在当时这样的环境当中，方先生开始时对于自己民族身份的认识不高也是情有可原。可以说，在北京遇到的教授让他看到自己有民族身份的优势所在。后来他转为进行西南民族研究，对于自己取材、民族身份的追根溯源都有着比普通研究更深层次的意义。

而对于身份的认识是一个流动的过程。方先生在后期进行研究的过程当中逐渐发觉到民族文化、历史、宗教、文字的灿烂，对于民族身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另外，他研究范围广泛，在研究其他民族的过程中认识到只有族群与外界进行交互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身份，因此在研究过程当中不断强调少数民族与其他民族的融合，共同发展。

在木芹先生回忆方先生的文章中有记叙：「先生知道我们是丽江来的学生后，非常高兴，得知我和李近春读历史系更为兴奋。先生与我们讲纳西语，说丽江事。先生听说我们高中班 17 人就有 7 人考上大学，认为这是件大好事。先生谈及他 20

⁴²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页 124。

岁负笈北京读书之事，勉励我们一定要好好读书。他让我们多去图书馆，特别要去藏书丰富的省图书馆，还说要给馆长打招呼，为我们提供方便。」⁴³

方老在云南大学任教后，对于地方民族身份更加有体悟。所以他对于丽江地区的学生更加有亲切感，希望他们能够像自己一样致力于地方史学的研究。对于民族文化有更清晰地认识。

另外，民族身份认同与国家对民族的认同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前，各民族被极度边缘化。「苗、夷、蛮、番」等称呼下，少数民族自信力也强烈缺失，他们似乎成为了落后野蛮的代表。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更正了少数民族的别称以及将 55 个民族确立下来。采取民族平等的民族政策。这无疑在政治上给予了少数民族的肯定与认同。以方国瑜先生为代表的社会群体在继学术研究的过程当中有了更明确的研究方向，对于少数民族的身份更加有自信。

2. 国家认同

方国瑜先生在 1918 年进入「丽江六属联合中学」读书，次年受到爱国运动「五四」的新思潮影响，心里对于同时代一起进步的要求更高了。此后方先生在北京积极进行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当中。在 1924 年 11 月中山先生发表《北上宣言》，后月方先生被推举为学生代表在北京站台迎接孙先生。之后，方先生经历了一系列的反帝斗争并且加入「新滇社」，每月定期对时局的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方先生还在报上发表多篇文章力图通过革命来救中国。

之后，在 1935 年，先生参加了「会勘滇缅南段界务」的勘界委员会工作。当时在报纸上出现相关消息时，方先生就开始担心「昌蒲桶」（今独龙江），该地交通不便，若被英国人所占，以汽车的时速，这块地区会被英国侵略者占领。为着这块区域，当时方先生一连写了《滇缅边界的昌蒲桶》、《葫芦王地之今昔》两篇论述当

⁴³ 《回忆方国瑜先生上》，《云南日报》（昆明），2012 年 2 月 24 日，第 11 版

地历史地理情况。以上不难看出，方先生在维护国家统一时表现出的强烈民族责任感。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方先生在边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对于实地有了了解。

在 1961 年方先生担任《中国历代与地图》西南部分的绘制工作。在绘制过程中，方先生认为云南省文山州全部和半部红河州应该划入南宁州都督府，但是主持方认为应划入安南都护府。最后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方先生也一直遗憾于此。从以上方国瑜先生的经历来看，方先生对于维护祖国统一有着很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而这种国家荣誉感来源于心底里对国家的认同，对于国家故土的完整性、历史文化的认同。

另外，在 1951 年方国瑜先生被选为云南省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的一员到北京参加国庆二周年的庆祝活动。在国庆前，毛主席招待给位少数民族代表进行用餐。方国瑜先生在途中向毛主席敬献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献给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永远跟您走。」后面还用纳西象形文字标注。落款为：么些族代表方国瑜。方先生自己在回忆当中说：「这是我应用纳西族象形文字最隆重，印象最深刻的一次。」⁴⁴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方先生对于国家的认同，是基于认同自己的民族身份当中呈现的。作为地方民族代表，表征与国家一起的决心，地方民族跟着国家的步调前进。方先生作为代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其中的关系。而从身份的体现上来说，锦旗上东巴象形文字的运用是方先生民族身份的展现，隆重的敬献是先生对于国家的认同，同时，笔者认为这里还有一层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在其中。

云南作为少数民族聚集区，民族众多，在此之中各族人民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同也不尽相同。若在发展过程当中，各民族将自己的民族身份独立于国家之上，不仅会分裂国家的国土，也会损坏国家的统一性。方国瑜先生在学术研究的过程当中早

⁴⁴ 方福祺，《方国瑜传》，页 112。

已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在进行边疆地区调查时，就对当地人民传播国家统一的思想理念。在考察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时，方老也同样注重于该民族对于国家的认同感。

方国瑜先生在 1943 年考察边区时所写的《滇西边区考察记》中关于傣族的文章《土族 土职》中有「且同为华族，何须分别，惟其习尚，稍有异同，凡此异同，并无是非美恶于其间，不容视为鄙野。」⁴⁵，「傣族虽文化低，但国家观念甚强，能爱护国家」⁴⁶。可见，方先生在当时已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讨论得较为透彻，力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基于以上的思想，方先生在研究西南地区的历史文化当中时，并不是单纯的将本地区的历史文化进行梳理，都是将其放置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当中进行考虑。

先生所写的文章《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一文当中的思想影响深远。先生的学生一木芹继续以先生的这个思想观点开展研究与深入探讨。方国瑜先生在文中否定了将王朝的疆域等同于中国的疆域，将历史上没有受到当时汉王朝统治，或者与汉王朝并存的独立政权或者国家看做外国的说法，称这些政权或者国家不应该视为外族。在文中他写道：「总之，中国历史，既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各族人民的历史，就应该包括他们的全体历史，不能『变更伸缩』。中国历史是有整体性的。」⁴⁷
「中国史应当讲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历史。」⁴⁸

在国家与地方的整体性关系上，方先生做出了解读，「政权的分立，并没有割裂了中国的整体，而且更加强烈地要求整体的发展，终于实现了统一。这一历史的

⁴⁵ 方国瑜，《滇西边区考察记》，页 244。

⁴⁶ 方国瑜，《滇西边区考察记》，页 254。

⁴⁷ 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页 5。

⁴⁸ 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页 16。

发展要求，存在于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当然，在此之中，方先生承认这中间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他认为这种性质长存在于族别之间，但是因为一致性结合在一起，有着共同的发展目标。

方先生在写作本篇论文时，详尽地论述了国家与地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他曾在《新纂云南通志族·姓考》中也写道；「中国所谓华夷之分，纯以其文化之发达与否为断，余不与焉。中华民族为整个民族，无论汉、满、蒙、回、藏、苗以及其他各族，皆华族中分支之氏系，亦即四海之内皆兄弟之义，此与狭义之民族观念固然不同。」⁴⁹我们不难看出，方先生对于国家的认同感是显而易见的。而方先生自己本身就是少数民族身份，他明白其身份的特殊性与存在必要性。因此对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进行了完整的诠释，以国家的统一与完整为中心。

杨杰宏在《论方国瑜的纳西文化研究及影响》一文当中写道：「方国瑜的纳西历史文化研究并非是纯碎的单一民族研究，他是把纳西族研究与云南民族史、西南民族史，与整体的中华民族史结合在一起，纳西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个成员，它的发展离不开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这个大背景。」⁵⁰

时刻将民族放置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大范围中进行讨论，对于本民族的发展以及国家统一完整都有非常积极的作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只有在认同自我的民族身份之后，才能够对所处国家有荣誉感与使命感。相应地，国家认同才能够产生。国家也才能长治久安。

(七)·「纳西学」研究的后人们

⁴⁹ 龙云。卢汉修、周钟岳《新纂云南通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49）卷169，页1。

⁵⁰ 杨杰宏，《论方国瑜的纳西文化研究及影响》，收入林超民编《薪火相传继长增高--方国瑜冥诞》（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页254。

1. 后代纳西族学者们的学术思想

所谓「纳西学」指的是：「指以纳西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既包括对纳西族的本体性研究，也包含这种研究本身。就前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的生存环境、存在历史、生活方式等都无不纳入其视野中；就后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者与成果、历史与活动都囊括于其内。」⁵¹笔者之所以将这部分后人们的思想进行一定程度的解读。原因在于在方先生作为先驱对于纳西族的历史地理等相关内容进行解读之后，后面促进了相当一部分的纳西族学者对于本民族文化进行研究。甚至于对于其他民族学者研究纳西族文化历史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方国瑜先生之后，李霖灿、和志武、郭大烈等一批大家开始投入到「纳西学」的研究当中，后期更是有和钟华、杨福泉、和少英、和品正、木丽春、杨杰宏等一批学者，他们的研究在云南地区乃至全国方面都有影响力。于1986年成立「云南省民族学会纳西学研究委员会」，其委员会在对于纳西学的研究方面有着一定程度的贡献与影响力。

在笔者的调查当中，与方国瑜先生同时期的纳西族学者还有有周霖、李霖灿等。因为治学经历相似，这里主要以周霖先生为代表叙述。周霖先生是著名的国画家，在画坛上有着一定的声望。与方国瑜先生有相似的求学体验，于1920年毕业于云属联合中学，其后随滇军出省，有机会前往上海、武汉、苏州、北京等地，由于自身对于美术的喜爱，曾经考入上海名画家曾刘海粟办的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直到后期1930年之后，周霖先生回到丽江，在中学当中任教。

自回到丽江之后，他将研究的方向着眼到当地的文化上面。对于当地的东巴经等著作进行研读，召集一些相关的文化人士定期举行「雪社」的集会，对于地方文化进行讨论。直到1950年代时期，他开始将原来国画的内容转化到自己的家乡上

⁵¹ 方国瑜，《致力于纳西学的崛起》，页2。

面来，当时比较出名的画作有《金沙水拍云崖暖》和《玉龙金沙》两幅作品，被送到人民大会堂进行展览。

此后，周霖先生一直对于丽江的各方面文化给予关注，凭借自己在画坛的崇高声望，他曾担任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副县长、云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在工作期间，积极保护丽江白沙壁画、将东巴经翻译为汉文，对于丽江的历史古籍保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周霖先生与方国瑜先生都是在早期具有外出经历的人，他们系统地接受过其他地方的学者专门的指导。在受到其他学者的指导与看法之后，回到云南之后再投入到地方民俗文化的研究当中。

不可否认，纳西族在 20 世纪五十年代出现的一批老学者们，因为自身受到外界良好的教育与老师的指点，在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回到家乡之后，将自己所学致力于研究地区文化。

在 1949 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当时的人们对于自己地区的各方面情况不是很熟悉，更不必说文化与习俗方面。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当时民族称谓也才逐渐被确立下来，地方人民存在对于新生活的茫然与无措当中。老一辈如方国瑜、周霖等学者们，在当时的环境下，更是加强对于地方文化史志研究工作进度。他们当时希望能够在研究地方史志之学的基础上，保障国家的统一，使得其基础稳定。

在此之后，对于「纳西学」研究的学者也越来越多。从研究的方向与成果来看，老一辈如方国瑜先生等所研究的内容多是以史志大方向为主，以云南边界、民族迁徙来源等等为主要研究方向。而致力于研究「纳西学」的后人们，则在前辈的基础上对纳西文化有了更精细地拓广。如杨福泉老师积极于地方民俗文化的研究，郭大烈老师进行纳西族政治制度、文化、历史的研究，和品正老师致力于纳西东

巴象形文字的研究等。这些后人对于纳西族的研究依靠方先生他们老一辈对于民族早期研究的成果，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对于地方文化做出更细致地解读。

2. 「纳西学」后人们民族身份及意识的强化

民族情感的开始到升华都需要整个族群的努力与加强。对于「纳西族」的称谓，方先生一直以来都翻越大量的历史材料进行力证。笔者注意到，在方先生最开始写的《么些民族考》论文当中，对于「纳西」称谓的解释如下：「又纳（音译）者黑也，纳西（音译）犹言黑人或黑族。」⁵²，而到了后期，方先生对此称谓的解释发生了变化，如上述，所写，「纳」应该取「大」的意思，应该是「大的民族」之义。对于名称解释的变化，对于地方人民对于自己民族的认同有着直接的影响。在笔者采访过程当中，无一例外接受采访的学者都坚持后面这个解释，认为前面这个解释对于本民族有污名化，影响其他民族看待本民族的立场。

事实上，在当时「么些」、「磨些」等称谓一般属于他称，《元史·地理志》当中写道：「至段氏时，么些蛮大裔后居于此甸」⁵³，樊绰云南志卷四写道：「磨蛮（新唐书南诏传作么蛮些蛮）」⁵⁴。

而所谓「纳西」（音译）、「纳日」（音译）等分布在不同地区的纳西族人民对于自己民族的称呼各不相同。据方先生考证，当时纳西（音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而这一支一般居住地为丽江坝子中。在后期方先生就选取了「纳西（音译）」作为统称。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民族识别」工作开展之后，「纳西族」得以正名。而方先生作为西南地区识别工作的主要人员，力将「纳西」作为取代「么些」的名

⁵² 方国瑜著，《么些民族考》，页 10。

⁵³ 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页 20。

⁵⁴ 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页 20。

称。当时方先生在翻译名号的过程当中尽管他认为「西（音译）」翻译为「人」，但是在中文的名称上，直接根据音译为「纳西」。在之后一直到现在的时间里，不同地区的纳西族人民对于此名号的叫法仍然有争论。

在此之后，国家对于少数民族的政策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障也同时出台。方先生在此之后对「纳西族」的地方史志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探讨。《华夏边缘》一书当中，作者对于文献所保存的历史记忆部分有写道「在一个社会中，通常只有一部分人有权力记录与诠释历史。这种历史忽略了许多个人的，社会边缘人群的历史记忆。」⁵⁵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当中，对于地方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研究者很少，相关成果也不多。

方先生作为当时研究西南地区较为有名的历史学家，其所著文献以及相关成果定然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当方先生将民族史志搬入众人的视野当中，再加上自己本身对于民族的情感倾注于其中。唤起了地区人民对于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再加上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个人对于族群的认同也就更加突出。

正如《华夏边缘》一书中所写道的「在社会生活中，社会记忆与集体回忆不断相互滋长，彼此影响，也因此强化了个人或群体的认同。」⁵⁶正因为方先生对于本民族地区名称的更正，恢复了本地乡民的历史记忆与认同。不再因为自己边缘少数民族的身份而受到不认可。强化了地方人民的个人民族情感。

3.如今少数民族学者身份的意义

在丽江的各大文化纪录片或者相关题材内容拍摄中，方国瑜先生一直以来都会以纳西族人民的骄傲居于榜首。他的故居被完整地保留在古城里供游人们参观。此外，以先生的名字所命名的小学「方国瑜小学」每年报考人数众多。「方国瑜奖学

⁵⁵ 王明珂，《华夏边缘》（台北：允晨文化，1997），页 123。

⁵⁶ 王明珂，《华夏边缘》，页 453。

金」一直以来也都是云南大学资助贫困学生的奖项设置。方先生以丰硕的学术果实，为地方民族的后人们做出了良好的榜样。因此当地极大的发挥与弘扬先驱的先锋作用，希望带动地方民族人民效仿。

后期对于纳西学研究的人物如郭大烈老师，在丽江当地开办「东巴文化传习院」，主要教授当地人民东巴文化与纳西话。在自身辛勤耕耘的同时，也对地方民族文化遗产作出贡献。地方少数民族学者在进行当地民族研究时，民族荣誉感会加深，对于民族文化复兴的期望也会高。因此他们往往会背负责任为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做出贡献。正是因为他们拥有少数民族的身份，才会对家乡、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认同情感。而这一点，是其他民族学者较难做到的。

在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当中，除了许多汉族学者积极进行田野调研之外，很多少数民族学者也积极投身于其中。如今经济、教育各方面条件趋于完备，少数民族学者都接受过完备的系统的现代化汉学教育，又因为自身成长环境的原因，得以受到母语的滋养。这种特殊的学术经历使得他们在研究地方民族当中，不仅仅愿意接受现代学术的方法来研究当地文化，更善于运用多重眼界和视角来看待民族中的现象。在这样研究的过程当中，更加增强了当地学者对于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感与荣誉感。在文化研究当中，更容易对地方文化与整个大文化做出比较，产生反思。

作为地方文化诠释的先驱者，他们更能够与汉族学者一起理性思考自己母文化当中的多元性与不足。在两种文化当中来往，不仅加深了自己身份的认识，还能够深化对国家的思想感情。

另外，少数民族学者在进行自己民族的调查研究时，有着天然的优势，例如对于周边环境熟悉，或者身份的相似性。因此学者在研究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会对研究对象以及相关内容予以最贴近人民生活的解读。地方少数民族学者在本地区的知

名度与影响力相较于汉族学者来说较强，因此其学术成果以及在研究过程中的情感态度对于本地区民族人民有极大的感染力。

如今，各少数民族聚集区都与汉族文化有着大量的交融和来往，大量的汉族学者也对各地区民族文化产生兴趣。而汉族学者因为对于田野环境有一定的距离感，因此常常能够对民族关系做出客观、深刻地解读。因此在当今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下，两方学者更应该互相交流。为地方民族学术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结论

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讨论的焦点。本篇论文主要以丽江纳西族地区为例，追寻早期纳西族学者方国瑜先生的人生及治学经历。研讨当时少数民族学者对于自己民族身份的看法以及国家情感的态度。

丽江地区现居人口 128.5 万人，其中纳西族人口占据 58%，从丽江成为一个世界知名的旅游城市之后，本地与外界的接触越来越广泛。受到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在笔者亲身经历的二十多年当中，本土生长的纳西族人民对于自己的民族身份仍然有着别样的感情。不认识的朋友见面也总是会用纳西语问：「你是不是纳西族？」，如果是，交流沟通也会以纳西语为主，双方情感也更容易拉近。在笔者看来，纳西族人民之间的关系不像广东、福建等地以宗祠家族关系为主，而真正是以民族身份为关系的族群联系。

在阅读王明珂先生的《华夏边缘》时，关于族群有这样的叙述「『族群』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存在于与其他族群的互动关系中」⁵⁷「我们都可以说，没有『异族意识』就没有『本族意识』，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没有『族群边缘』就没有『族群核心』」⁵⁸。纳西族人口势力小，地方面积不大，为了能够在众多民

⁵⁷ 王明珂，《华夏边缘》，页 423。

⁵⁸ 王明珂，《华夏边缘》，页 423。

族中求得生存，纳西族最早就开始接触汉文化，接受中央的领导。因为在早期就开始与其他民族进行互融与交流，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对于自己民族的关系了解与认识得比较透彻。在对待「异族」时候，自己本民族的「本族意识」在潜意识就已经开始产生。

方先生从丽江到北京外地求学，在长期与本民族人民相处之后。一旦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其他地区的人民对他边疆身份的看法，对他少数民族民族身份的看法。都全然影响着他对自我的认知与看法，这其中有对自己少数民族身份的认同。

因此在前期，纵然这种「本族意识」在方先生的头脑中存在，但先生还没有得到老师的点拨和开始自己的学术经历。因此很多的情感态度转换未得以展现，甚至于先生仅仅在文化层面上对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做理解，并未完全认同自己的民族身份。而到了后期，先生在中心地区发现自己的研究方向边疆，对于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也开始一步一步加强与提升。直到最后，方先生获得少数民族代表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时候，他在锦旗上专门落款「么些族代表方国瑜」，笔者认为，这是对于自己民族身份完全认同的表现。

本篇论文在写作过程当中，因为方先生著作以及平日读书笔记等资料难以找到。另外，其他学者对于方先生的情况记录也较为稀少，因此在论证过程中笔者不能够将相关的材料一一详实补充完整，只能在以后有机会的时候见到的时候，再对其多加注意。

方先生从开始到结束的学术经历当中隐晦包含的自我民族身份认同。方先生后期致力于边疆历史，成为了「滇学」的开创者，这种转化背后不仅仅是自我的认同，背后更是对于自己家乡，自己民族的认可。由于方先生对于地方民族史做出的贡献，在国家解决云南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事务时，首先将其重用。这时先生的身份再次转换为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扮演者。可以说在当时社会当中，方先生优秀

少数民族研究者的身份，对于西南地区的影响是较为深远的。

文章最后一部分，对于因为方先生影响而进行「纳西学」研究的后人群体们进行了一定的解读，对于像方国瑜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身份的优秀学者们，是如何在研究地方史中取得中心与边疆的文化关系的认识与民族身份的认同。他们在方先生等一批先驱者的道路中找到更精细的民族文化研究方向。在众多纳西族学者的影响下，纳西族本族人民对于自己的身份也同样持有肯定的态度。

应该说，身处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如何取得国家认同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篇论文选取了具有民族身份的先锋学者——方国瑜，解读他如何运用自己知识理论平衡中心与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他的在学术成果上展现的家国感情对地方人民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四· 参考材料

专书专著

1. 方福祺,《方国瑜传》。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2. 方国瑜,《滇西边区考察记》,昆明: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1943。
3. 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4. 方国瑜,林超民编,《方国瑜文集第一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5. 方国瑜,林超民编,《方国瑜文集第二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6. 方国瑜,林超民编,《方国瑜文集第三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7. 方国瑜,林超民编,《方国瑜文集第四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8. 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
9. 方国瑜,《彝族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10. 娄贵品,《方国瑜与中国西南边疆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1. 王明柯,《华夏边缘》。台北:允晨文化,1997。
12.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台北: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2007。
13. 江应,《摆夷的经济文化生活》,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14. 陈友康、罗家湘,《20世纪云南人文科学学术史稿》,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15. 左玉河,《移植与转化——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建立》,河南:大象出版社,2008。
16. 徐泓祖,《徐霞客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7. 约瑟夫·洛克,《丽江古纳西王国》。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9。
18. 杨世光,《丽江史话》。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19. 林超民,《林超民文集》第一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20. 林超民,《林超民文集》第二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21. 林超民，《林超民文集》第三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22. 林超民，《林超民文集》第四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23.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
24.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北京：三联书店，2008。
25. 云南省编辑委员会，《云南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 1》，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26. 云南省编辑委员会，《云南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 2》，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27. 云南省编辑委员会，《云南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 3》，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期刊论文

1. 辜永碧，〈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的彝族史研究——以方国瑜、马长寿和冯汉骥三位先生为例〉，《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第五期，2015 年，页 12。
2. 超民，《方国瑜在国学研究中的贡献》，收入《丽江民族研究》第三辑（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 年），页 123。
3. 林超民，《整体性：方国瑜的理论贡献》，《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页 53。
4. 马大正，《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历史研究》1996 年，页 23。
5. 王国梁，《方国瑜历史地理学思想研究——以〈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为中心》，云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9，页 76。
6. 王传，《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与现代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史学史研究》，2010 年，页 54。

7. 贺圣达，《『南诏泰族王国说』的由来与破产》，《中国社会科学》，2003，页 87。
8. 余斌，《说顾颉刚，兼及龙云、方国瑜》，《书摘》，第 5 期，2008 年，页 35。
9. 陈茂荣，《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学术界》，2011，页 25。

论文集

1. 方国瑜，〈略论白族的形成〉，收入云南人民出版社编《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75 年，页 25。
2. 方国瑜，〈么些民族考〉，收入白庚胜、和自兴主编，《纳西学论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页 7—75。
3. 潘先林，《家国情怀 书生本色：方国瑜先生的边疆学研究》，收入林超民主编，《西南古籍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 年，页 312—319。
4. 杨杰宏，《论方国瑜的纳西文化研究及影响》，收入林超民编《薪火相传继长增高--方国瑜冥诞》。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 年，页 254。
5. 杨文辉，《一部不应该被忽略的佤族研究著作——读〈滇西边区考察记〉》，收入那金华编，《中国佤族「司岗里」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页 78。
6. 杨福泉，《「改土归流」中的「以夏变夷」对纳西族社会的影响》，收入王筑生编《人类学与西南民族——国家教委昆明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论文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年），页 624—643。
7. 林超民，《文章惊天下 道德著春秋——代宗师方国瑜》，收入林超民编《林超民文集》第二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页 56。

古籍

1. 管学宣、万咸燕，《丽江府志略》。丽江：丽江县志编委会办公室翻印，1992。
2. 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3. 龙云、卢汉修、周钟岳等，《新纂云南通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49。